

“左联五烈士”殷夫：

我是革命的忠臣

俞宽宏



殷夫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到会盟员40余位。这次会议，殷夫是同他的领导李伟森一起参加的。

左联成立时，殷夫还不满20周岁，是最年轻的左联发起人之一，但他此时已有参与地下斗争的磨炼，革命斗争的思想日益成熟。

三次入狱的太阳社战士

殷夫同革命文学界的联系，始于1928年初。这年1月《太阳月刊》创刊号发行没几天，编辑部就收到了一束署名殷夫的诗稿。主编阿英回忆：

我立刻被这些诗稿激动了，是那群充满着热烈的革命感情。从附信里也证实了他是“同志”。于是，我不自觉的提起笔，写了复信，约他来上海。还很快的，以非常惊喜的心情，告诉了光慈、孟超和其他同志。

殷夫当时还不满18周岁，尚在吴淞同济大学附属德文补习科学习，他寄给《太阳月刊》的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几天第一次被捕时在狱中写成的长诗《在死神未到之前》。得到阿英复信后，殷夫准时到上海同太阳社的几位主编见了面，接着参加了太阳社，成为太阳社最年轻的社员，同时接上了组织关系。之后成为太阳社的《太阳月刊》《新流月报》《拓荒者》各期刊的经常撰稿人。

1928年夏天，学期尚未结束，因参加地下斗争，殷夫再次被捕入狱。其后由家人托人出面保释出狱，不得不于9月下旬回到老家浙江象山的一所小学教书，度过了一段隐蔽的生活。

1929年2月底，殷夫离开象山赴上海寻找党组织，完全脱离学校生活，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道路。从3月接上党组织关系之后，殷夫满腔热情，一边积极参加党的地下斗争，一边开始了红色鼓动诗的创作，同时还进行诗歌翻译工作。1929年6月中旬，因为编辑《奔流》，鲁迅收到了殷夫寄给他的一组稿件《彼得·菲·山陀尔行状》（即裴多菲传略），由此开始了同殷夫的交流，并于6月26日托柔石送给他两本书。

当时殷夫正住在宝山路底近天通庵车站的一条马路上，那儿有一排简陋的三层住房，离鲁迅住的景云里很近。因为全取党领导的丝厂罢工斗争，殷夫十分繁忙，难得有空闲时间看书写作，住在底楼的楼道里有事找他都是深夜匆匆而来。

1929年7月中下旬，殷夫第三次被捕入狱。这次因为没有暴露身份，国民党反动当局只把他当成一个普通工人，是他自己出来的。出狱后殷夫“继续热烈地重新投入地下的战斗”，身无分文。9月21日酷暑未消，殷夫穿着一件大棉袍汗淋漓淋会见鲁迅。鲁迅回忆：

我们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

鲁迅对殷夫的关怀十分细致。从7月4日第二次见面之后，鲁迅3次都以付稿费的名义给殷夫以帮助。当时北新书局“办事糊涂，常常拖欠”作者的稿费和编辑的编辑费，所以稿费常常是鲁迅垫付的。鲁迅在《奔流》上发表殷夫诗作和译作，是间接对殷夫从事地下斗争的一种积极支持。

1929年11月，经过长时间的考察，殷夫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出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干事。殷夫在宣传部长李伟森的领导下，参加团中央机关刊物《列宁青年》和青年反帝大同盟公开刊物《摩登青年》的编辑工作。这是一条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道路，选择这条道路就意味着要为人民大众的自由幸福奋斗和牺牲。

1930年1月初，殷夫把他1924年至1927年秋写成的65首诗稿，集成《孩儿塔》集，写好《题记》，一并呈送鲁迅审定，并请鲁迅作序。殷夫牺牲后，此诗稿得由鲁迅保存下来。因为编辑《萌芽》，鲁迅与殷夫的书信往来一



▲署名为“白莽”的殷夫《孩儿塔》手稿

直延续到左联成立之后的1930年的3月14日。1936年3月11日，鲁迅在大病初愈后“为白莽诗集《孩儿塔》作序”。称《孩儿塔》“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对于先驱者的爱的大露，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

普罗诗派主张

1929年是殷夫诗歌创作成就非凡的一年。《别了，哥哥》《意识的旋律》《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等大量普罗诗歌都是这年夏秋之际的力作。尤其是这年11月之后，借助宣传干事这个新平台，殷夫诗情高涨，于1930年上半年形成了一个普罗诗歌创作发表的新高潮。

对于殷夫这位“非常的喜爱”的“小弟弟”，太阳社对他的诗歌才华是十分赞赏的。1930年1月，太阳社停刊《新流月刊》改出《拓荒者》。《拓荒者》创刊号首篇刊载的就是殷夫的组诗《我们的诗》，这些诗大部分创作于11月诗人赴任共青团宣传干事之时，鲜明地表达了他为民众解放奋斗的坚定意志。殷夫在《拓荒者》上高歌：“我们把旗擎高，号儿吹震天穹，只是，走前去呵，我们不能不动！这尚是拂晓时分，我们必须占领这块大地，最后的敌人都已逃尽，曙光还在地平线。”鲁迅、马宁等人都是读到殷夫在《拓荒者》上的这些诗作，才进一步增加了对他的了解，鲁迅说“直到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后，我才知道我所认识的白莽，就是在《拓荒者》上作诗的殷夫”。

以《拓荒者》创刊号为先机，殷夫先后在《拓荒者》第二期上发表《诗三篇》，在《拓荒者》第三期上发表《写给一个新时代的姑娘》，在《拓荒者》第四五期合刊上发表小说《“March8”》和诗歌《血字》（外六首）。《血字》（外六首）也编排在合刊的首端刊发，这期合刊是《拓荒者》的终刊，出完之后即被封。《拓荒者》是左联前期最重要的机关刊物之一，它的创刊号和终刊号均以殷夫的诗歌做发刊先锋。这种特

殊安排绝非偶然，显然是左翼文学界对殷夫诗歌地位的一种共识，也是对他诗歌所呈现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和大无畏英雄气概的一种坚定表彰。

在给《拓荒者》供稿的同时，殷夫也在《萌芽》和《巴尔底山》上发表文学随笔和诗歌。《萌芽》创刊于1930年1月，它的第一期和第三期上分别发表了殷夫几篇随笔；第四期上发表他的诗歌《囚窗》（回忆）、《前进吧，中国！》，小说《小母亲》；第五期上发表他的长诗《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巴尔底山》创办于左联成立之后的4月11日，第5期后被禁。早在《巴尔底山》创刊之时，殷夫就被推定为这个期刊的基本撰稿人之一。殷夫在《巴尔底山》第1号上发表了诗歌《奴才的悲泪——献给胡适之先生》，第5号上发表诗歌《巴尔底山的检阅》。这些文学创作立场鲜明，战斗气息相当浓郁。

《拓荒者》《萌芽》《巴尔底山》都是左联初期最具影响力的机关刊物，殷夫发表在左联机关刊物上的这些诗作，连同他在《列宁青年》《摩登青年》发表的部分优秀作品，突出地展示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殷夫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这个阶段，殷夫事实上扛起了前辈郭沫若、蒋光慈之后普罗诗歌创作的大旗，成了左联成立前后中国普罗诗派的领军人物，在文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殷夫牺牲后，鲁迅为纪念左联五烈士所写的文章和《孩儿塔》所作的《序言》，明确地评述了殷夫诗歌创作的时代意义。

普罗诗社是左联成立之后的4月16日诞生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太阳社的蒋光慈、殷夫和任钧。他们明确提出要在诗歌创作中把“实际斗争和我们阶级的意识反映到艺术上去，摧毁资产阶级的艺术！”使诗歌创作“成为普罗阶级的武器，向着资本主义社会冲锋”。殷夫17岁就开始普罗诗歌创作，1929年3月之后，殷夫结合自己在社会底层从事地下斗争的经历，积极为无产阶级革命鼓与呼，写下了大量的无产阶级革命赞歌，诗情澎湃、激情洋溢。

忠诚的左联盟员

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树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地位，指出“文学运动的目的在求新兴阶级的解放”“从事文学新兴阶级的文学创作”。左联强调，左翼文艺家一定要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文艺家要为“工农大众”服务，积极关心普通劳苦大众的疾苦，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而奋斗。作为左联发起人之一，殷夫自始至终执行了左联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

在文学创作上，殷夫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积极写诗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鼓与呼。尽管年轻，但他早已成为《拓荒者》最主要的撰稿人。《萌芽》是冯雪峰主编的，同鲁迅关系紧密。《巴尔底山》虽然是创造社后期成员李一氓主编，但其经费首先出自鲁迅。殷夫积极为这些左联机关刊物供稿，大量发表自己创作的无产阶级革命诗歌和散文，完成了自己作为左联盟员的任务。

作为左联在普罗诗歌创作领域的一位领军人物，除支持左联自己的期刊之

外，殷夫还在自己参与编辑的《列宁青年》和《摩登青年》上发表诗作。1930年4月10日《摩登青年》（第2期）出版，殷夫发表了《与新时代的青年》《伟大的纪念日》两诗。1930年5月1日《列宁青年》（第2卷第12期）出版，殷夫发表《五一歌》。同年6月20日《列宁青年》（第2卷第15期）出版，殷夫发表《我们是青年的布尔什维克》。此外，殷夫还在《列宁青年》（第2卷第10期）发表诗歌译作《青年的进军曲》。

在思想行动上，参加左联之后殷夫为革命奋斗的热情更高，意志更坚定。1930年2月，他在《列宁青年》上发表了几篇从俄文翻译过来的少共国际的文件，使阿英“感到他真是一个天才，几乎想把他抱了起来”。参加左联之后，他革命的意志更坚强。3月11日，也就是左联成立大会之后的第9天，他写下了一篇长文《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深入剖析了自己和哥哥矛盾产生的本质，指出兄弟两人属于不同的阶级、两者无法协调，表明了自己要为无产阶级革命、为人民大众解放奋斗的决心。此后，殷夫结合上海和国内国共两党斗争的形势，针对苏维埃运动的发展现实，在《红旗》《列宁青年》上发表多篇政论文和中国青年运动的指导性文章，为推进青年工作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直到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的1930年10月初，殷夫还在《列宁青年》上发表《英美冲突与世界大战》一文，积极推动苏维埃运动向前发展。

作为左联盟员，殷夫积极参与了左联的历次重大活动。1930年4月29日，也就是左联成立之后的第二月底，为了更好地指导盟员工作，左联召开了第一次盟员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左联决定由《拓荒者》《萌芽月刊》《巴尔底山》《艺术月刊》等13家刊物的有关人员作编委，为纪念五一联合编辑出版一期《五一特刊》，随刊赠送。殷夫在这期特刊上以莎菲为笔名发表了《暴风雨的前夜——公共汽车电车大罢工》一文，这显然是对左联工作的支持。

1930年5月29日，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五卅”纪念日，左联在上海市南京路的大金门饭店召开了第二次全体盟员大会，大会通过了全体盟员一致参加纪念“五卅”示威运动的决定，并准备在“五卅”纪念日自动启封被国民党当局查封的中华艺术大学。殷夫与鲁迅、茅盾都出席了这次会议。为了这个纪念日，殷夫特地写了长诗一首《我们是青年的布尔什维克》。诗中写道：

我们生在革命的烽火里，我们长在斗争的律动里，我们是时代的儿子，我们是群众的兄弟，我们的摇篮上，招展着十月革命的红旗。

我们的身旁是世界革命的血流，我们的面前是世界共产主义。

诗作激情洋溢，充满了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精神、革命英雄气概和对未来的必胜信念。

左联成立当年，曾召开了四次全体大会。因为秘密环境下召开的，我们现在没有文献材料显示殷夫是否全部出席了这些会议，但考虑到他同鲁迅、阿英、柔石、冯铿等人的紧密关系和他对革命的热情，没有特殊情况，他应该会出席这些会议的。1930年9月17日，左联发起为鲁迅祝寿活动，地点在吕班路50号荷兰菜馆，殷夫也参加了。“殷夫、胡也频举杯向他祝寿”。1930年12月底或次年初，左联再次召开了一次盟员会议，鲁迅出席了这次会议，带了一本德文书准备给殷夫，但没碰到他。到1931年1月15日，也就是殷夫被捕前2天，鲁迅只好把书委托魏金枝转交，再次显示了鲁迅对殷夫的特别关怀之情。

1931年1月16日，殷夫如期出席了文委设在上海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洛阳书店秘密机关召开的左联全体共产党员大会，次日在东方旅馆被捕。从参加左联到被捕牺牲，殷夫始终是左联盟员中最坚定的一分子，为左翼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1年2月7日，殷夫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连同其他4位左联盟员一起被国民党反动军警残害在龙华司令部旁边制造局的大烟囱下，年龄尚不满21周岁。

“我是革命的忠臣，我有无涯的热情。”这是殷夫对待无产阶级革命的忠贞态度。为了革命，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自由，殷夫积极参加党领导下的地下斗争，赴汤蹈火在所不惜，虽多次被捕仍然对革命满腔热情。

及至今天，殷夫牺牲已经90余年。作为左联的革命先烈，殷夫的事迹，他的牺牲精神，他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是一份值得我们永远珍惜的精神财富！

（作者单位：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

鲁迅创办《越铎日报》

朱小毛



WENREN YISHI

武昌起义后，全国各地“咸与维新”。当时，绍兴知府程赞育顺应时代大潮，出面组织了军政分府，其实是新瓶装旧酒。于是，南社绍兴分社——越社便派代表到杭州，要求革命军开驻绍兴。革命党人王金发应请开入绍兴，组成一个新的军政分府。

王金发上任伊始，据鲁迅回忆：“民元革命时候，我在S城，来了一个都督。他虽然也出身绿林大学，未尝‘读经’，但倒是还算顾大局、听舆论的。”但时间一长，终究经不起诱惑，“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短席，捧得连他自己也忘其所以，结果是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到地皮。”越社里激进分子于是以为要用报纸来监督、批评新政府。

1912年1月3日，以鲁迅为领衔的三人小组，另外两人是陈子英、孙德卿，在家乡绍兴创办了一张《越铎日报》。《越铎日报》是鲁迅起的名字，意为“报为铎铎，亦为警钟”。越之铎，绍兴人民给“公仆”敲响的警钟也。鲁迅作为名誉总编辑，他以“黄棘”的笔名题写了创刊词——《〈越铎〉出世辞》。文章警示众人，中国专制久长，昭苏非易，因此需要长久下去的民主斗争和建设。“纾自由之言论，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是其新闻自由的理念和办报的宗旨。



WENREN YISHI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1902年出生于湖南凤凰县。

沈从文少年时可以说是顽劣不堪，常常逃学去外面游荡。他为了能在街上看木偶戏，经常不去上课，将书包藏在土地庙里，有时就这样看一整天的戏。一次，他照样把书包放在土地庙，看完了戏，别的孩子早已放学回家，他再回到土地庙里取书包时，才发现书包不翼而飞。第二天他就这样空着手去学校，老师大声责问他昨天到哪里去了。沈从文不慌不忙地回答：“看戏去了。”老师气得骂他：“勤有功，戏无益，树喜欢向上长，你却喜欢在树底下，高人不做，矮人学，太不争气了！”经过教育，沈从文稍稍有所收敛。

1917年，沈从文当兵了。那时候当兵是一条出路，当然最现实的目的是谋口饭吃，沈从文家特别困难，他去投军，也算是解决了一个人的吃食问题。他参加的是湘西靖国联军第二军游击第一支队，驻防辰州（沅陵）。在部



WENREN YISHI

汪曾祺是当代著名作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也是一个地道的的美食家。汪曾祺有句著名名言：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区区12个字道出了人间食事，烟火可亲，一碗人间烟火是多么令人向往，让人喜爱。读着他这样的金句，怎么不喜欢他笔下的文字、手下的菜肴呢？

汪曾祺的《食事》中收录的是他写于20世纪的一些与食物和生活有关的随笔，无论是萝卜、豆腐、栗子、土豆、韭菜花等家常小菜，还是米线、手把肉、豆汁儿、高邮鸭蛋等地方风味，每一样在他笔下都鲜活起来。他写的饮食文章和做的菜肴都是备受推崇的。

汪曾祺因爱好做菜，所以也爱逛菜市场。他说：“到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可去逛菜市。看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果，红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活之乐趣。”

汪曾祺做菜无数，其中“干贝烧小萝卜”可以说是他的拿手菜、看家菜。台湾女



WENREN YISHI

1973年春天的一天，气象学家竺可桢及其夫人陈琦来看望叶君健一家。以前竺可桢常为孩子们写些关于气象的科普文章，叶君健长期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所以，他们二人还常在一些编辑部召开的儿童文学和科普文艺创作座谈会上见面。他们互为对方的兴趣爱好和性格禀赋所吸引，成为志同道合的知己。

当时，叶君健是“牛鬼蛇神”，每天的工作就是扫厕所。竺可桢听说叶君健每月只有生活费45元，其余工资都被冻结，颇为拮据。因此，他和妻子商量每月给叶君健送来100元接济家用。

当时，竺可桢不但鼓励叶君健珍惜过去已熟练掌握的外语也不要轻易荒废，同时还提醒他应该利用造反派忙于打派仗而疏于管理之机进行创作。“一语惊醒梦中人”，叶君健听了竺可桢的话，又想起鲁迅说的“我倘能生存，仍要学

《越铎日报》甫问世，兼抒发“自由之言论”的精神，以“官威如故，民瘼未苏”，“开首便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此后是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鲁迅还建议开设了一个“稽山镜水”的专栏，专门刊登批评的文章，此外还有“自由言论”等栏目。当时绍兴有“新民谣”的“光复后十嗨气歌”，其中之一是“绍兴多一报馆，民贼晦气”。

报纸的言论针锋相对，结果就让王金发们吃不消，于是“有一种消息传到我的家里来，说都督因为你们诈取了他的钱，还骂他，要派人用手枪来打死你们了”。所谓“诈取”，是王都督给了报馆一笔经费。《越铎日报》领了都督的钱，又要骂都督，岂不是坏了规矩？所以当王都督派人送来500元经费后，报馆展开了讨论，该不该收他的钱？收钱之后还要不要骂？讨论之后依旧照骂不误！理由是“收钱之后，他是股东；股东不对，自然要骂”。鲁迅原先反对接受资助的，但报馆的会计责问他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他只好选择沉默。幽默中，鲁迅也预见到报社的将来。

果然，好景不长，待鲁迅赴南京公干，1912年8月，王都督派兵捣毁了编辑部，《越铎日报》不幸早夭夭折。一份自由、民主、战斗的报纸，在封建主义的愚民政策摧残压制下，香消玉殒。

沈从文改名

周二中

沈从文算是有点文化的人，官兵都叫他“身小师爷”。一次，他到司令部去办事，军法处长名叫肖选青，是一个又高又大的胖子，但是这个人读过书。他听别人叫沈从文为“身小师爷”，于是问：“身小师爷，你叫什么名字？”

原来“焕乎，其有文章”这句话出自《论语·泰伯》，是为颂扬尧治天下的功德之辞，说尧的功业巍然焕焕。这里的“文章”是指经纬地纬的功业。

沈从文一听，感觉不错，于是真就将自己名字改了。沈从文之所以这样乐于改名，一方面当然可能是长官的话不听，违拗了总不好。二来，当时部队里，有文化的人都处在上层，这也刺激了他求知的渴望。此外，原来的名字岳焕笔画太多（焯焕），不如从文（从文）那样简单明了，写起来方便。所以改成从文，好处多多。

美食家汪曾祺

张雨

作家陈怡真和她的丈夫到北京来，指名让汪曾祺做干贝烧小萝卜。北京小红萝卜一年里只有这几天最好，早几天，萝卜没长好，水分少，发良，且有辣味，不甜；过了几天，又长过了，糠。陈怡真运气真好，正赶上小萝卜最好的时候。一道干贝烧小萝卜上桌，陈怡真吃得津津有味，她边吃边对这道小菜赞不绝口。据说她把剩下的一点干贝烧小萝卜，打包带回宾馆去了。

一次，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到北京同样是那个时节，同样是让汪曾祺做干贝烧小萝卜。汪曾祺说：“聂华苓吃得非常开心，最后连一点儿汤汁都端起来喝了。”

由此看出，汪曾祺的干贝烧小萝卜是多么富有名气，一道菜香倒了一群作家朋友。汪曾祺在烹饪方面确实是极有天赋的，他做的每一道菜都极为成功。他是快乐的，他的快乐不仅仅在于自己吃好喝好，还在于他做的菜能让别人也吃出快乐来。就不仅自己乐在其中，还感染了不少人文学者和读者。

作家汪曾祺，是一个可爱的美食家！

叶君健茅房扫出“三部曲”

崔鹤同

这样，叶君健白天干活，晚上脑子异常清醒。心想，这是搞写作的“黄金时刻”，应该倍加珍惜。于是，每天晚上他就躺在卧室兼书房的屋子里，拉下窗帘，开始秘密地写起《土地》三部曲来。那时大家都“六亲不认”，互不来往，所以也没怎么，清静得很。他每天计划写2000字，进展很快。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时，三部曲也快完成了。《土地》三部曲由《火花》《自由》和《曙光》三部长篇组成。叶君健又观望了一年，看来形势不会逆转了，这才把它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

《土地》三部曲气势恢宏，这和叶君健创作的《山村》《旷野》和《远程》三部长篇合称《寂静的群山》，1988年荣获了丹麦女王玛加丽特二世颁赠的“丹麦国旗勋章”。